

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发展

李安山

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跨过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界限,把整个世界联结成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对彼此孤立的封闭体系的冲击,不仅打破了传统经济的闭关自守状态,同时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狭隘性,“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①近代西非的民族知识分子是西方文明输入非洲的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的殖民活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殖民区中的一个胚胎到活跃在反殖斗争中的一支政治力量就是它成长演变的全过程。本文探讨的近代西非民族知识分子是指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接受了一定程度的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在遭受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是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在近代西非这个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活剧。

西非知识分子的早期来源

早在奴隶贸易时期,西非沿海就出现了一些对西方文化有所接触了解的本地人。但这些人及其后裔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以中介人的身份周旋于西方商人与本地酋长之间,加上人数少,社会影响小,因此,他们并未构成近代知识分子的主要源流。综合近代西非的早期历史,知识分子的最初来源主要有两支:西方传教士建的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和从美洲归来的“克里奥人”。任何历史现象必然是一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从客观上说,西非近代民族知识分子的

形成是与早期传教士在非洲的活动和十九世纪前期兴起的废奴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教会活动是直接为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开辟道路的。西方传教士一方面通过在非洲传教了解当地情况,为殖民侵略提供有关的语言学、人类学知识及历史地理概况,更重要的则是力图通过对非洲进行奴化教育培养他们所需的人才,对此他们从不掩饰。法国的传教士1857年谈到达喀尔的教育情况时说,教育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培养受到良好教育和负责的青年人,他们能作为行政管理、技术部门、陆军和海军据点的雇员,在殖民活动中和商站里作出实际和有用的贡献;另一方面,培养诚实干练的工人,他们能帮助甚至监督时刻听从殖民政府支配的那些人”。^②

从十八世纪始,西方传教士在西非的活动已不是个别现象。与西非发生关系的第一个英国教会是圣公会福音传布会,早在1701年就创立了。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圣公会牧师查普伦在海岸角建了一所学校;1765年又在此重建了一所学校,由一位在欧洲受过教育的非洲牧师菲利普·奎克领导。^③随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14页。

②约翰·D·哈格利乌斯:《法国与西非:历史文件选集》,麦克米兰,1969年版,第102—103页。

③J·D·费奇:《西非简史》,剑桥1969年版,第128—129页;D·基姆伯:《加纳政治史(1850—1928年)》,牛津1965年版,第63页。

后，西方传教士在沿海城市和据点建立了一批教会学校，如海岸角、阿克拉、弗里敦、拉各斯、戈雷、圣路易等地。到十九世纪中叶，卫斯理会已在黄金海岸一带十八个城镇建有学校，此外，还有巴塞尔传教团、不来梅传教团等。^①1827年，由英国行教会建在塞拉利昂的福拉湾学院专门培训教师和教士，在冈比亚的巴瑟斯特和巴考等地，卫斯理传教士和公谊会也在二十年代建立了第一批教会学校。^②法国的天主教在西非的活动可追溯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但直到十九世纪初法国传教士才在圣路易正式建立学校。1826年，一位修女先后在圣路易和戈雷建立了女子学校，对非洲本地人进行教育，并将有希望的非洲人带到法国作为教师培养^③，1857年，圣灵传教会已在达喀尔建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和一所职业学校。^④

实际上，教会当时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和本国政府达成某种协议。英国殖民大臣在1829年7月3日给塞拉利昂代理总督利基兹的信中谈到政府和英国行教会的协议，“根据1824年协议，英国行教会承担向殖民地居民提供宗教教育的责任，政府负责为传教士提供住房、礼拜堂，并为殖民地青年提供学校教育。”^⑤然而，早期殖民地的教育活动主要还是靠传教士进行的。如在尼日利亚，1899年以前竟然还没有一所官办学校。在冈比亚，1900年提出的教育补助金只有650镑（实际补助只有416镑），而警察维持费却高达4,701镑。^⑥

正是这些早期传教活动，造就了近代西非第一批知识分子，其卓越代表是阿非利堪纳斯·霍顿。霍顿于1835年出生于塞拉利昂的一个木匠家庭，10岁就进了英国行教会办的学校，18岁时转到福拉湾书院。1855年受英国行教会推荐，霍顿被选送到英国学习。三年后，他成为皇家军医学会成员，并于1859年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硕士学位。^⑦除

了在医学上很有造诣先后出版了六本关于西非地理气候条件及地方病的专著外，他潜心研究了西非的历史和现状，发表了《英属西非的政治经济》（伦敦，1865年）、《西非的国家和人民》（伦敦，1868年）和《关于黄金海岸政治状况的信件》（伦敦，1874年）等政治著作，有针对性地批驳了种族主义谬论，就西非的行政管理和文化教育等问题向殖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向西非人民灌输近代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这些著作对西非后来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很大。在他逝世时，西非一位著名学者写诗悼念这位西非近代民族知识分子的先驱：

“你的英名将作为人民的歌声，
你的价值必将为人民所传颂，
你的著作将引导你的种族前进……”^⑧
我们知道，到原始积累后期，资本逐步

① D·基姆伯：《加纳政治史（1850—1928年）》，第63—64页。

② 黑利勋爵：《非洲概览》，牛津1957年版，第1179页；小哈里·A·盖利：《冈比亚史》，伦敦1964年版，第68页。

③ 小威克利·约翰生：《塞内加尔黑人政治的出现》，斯坦福1971年版，第139页。

④ 约翰·D·哈格利乌斯：《法国与西非：历史文件选集》，第103页。

⑤ 英国殖民部文件：268/28，引自C·W·纽伯利：《英国对西非的政策文件选集（1786—1874年）》，牛津1965年版，第189页。

⑥ 冈比亚政府，1900年冈比亚预算提案；《法令第4号，1901年》，引自小哈里·A·盖利：《冈比亚史》，第69页、第177页。

⑦ J·阿非利堪纳斯·霍顿：《西非的国家和人民》，爱丁堡大学1969年版，再版前言；克里斯托夫·法伊夫：《阿非利堪纳斯·霍顿，西非的科学家与爱国者》，牛津1972年版，第19—35页。

⑧ 克里斯托夫·法伊夫：《阿非利堪纳斯·霍顿，西非的科学家与爱国者》，第156页。

从商业转到工业，工业革命的发展已经提出了新的问题，即销售市场、原料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问题。这样，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的不同意见出现了，“自由人制作的产品，归根结底，比奴隶制作的产品成本低廉”（亚当·斯密语）。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思想使欧洲大陆上的人道主义勃然兴起。到十九世纪前期，欧洲国家相继放弃了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包括在殖民地），废奴运动风靡一时。

西非近代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所谓“克里奥人”，即废奴运动中被释放的奴隶或奴隶的后裔。当时，美国有些人组织了殖民协会，帮助一些自由黑人返回非洲。一些黑人从海外（北美、巴西、古巴等地）回到非洲，首先在利比里亚或塞拉利昂落户，继而散居在西非沿海地区。在塞拉利昂，他们被称为“克里奥人”，在拉各斯被称为“巴西人”和“萨洛人”，在达荷美被称为“克里奥人”或“巴西人”，在塞内加尔被称为“克里奥人”或“梅蒂人”。^①

达荷美的法国行政长官曾这样评价克里奥人，“一群称为克里奥人的居民特别值得注意，他们约有500人，大部分是从巴西回来的黑人，所占比例要比从拉各斯、塞拉利昂和黄金海岸来的黑人要小。他们中有天主教徒、新教徒甚至伊斯兰教徒，几乎所有人都说葡语，有些人说英语。他们能阅读、书写这些语言，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他们的穿着像欧洲人，……所有的克里奥人完全理解〔欧洲人〕公正原则的结构……”^②。塞内加尔的克里奥人大都受过教育，懂法语；塞拉利昂的克里奥人甚至不许自己的孩子说克里奥语。这些人自成体系，对殖民国家非常崇拜，极力模仿欧洲人的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因此被人称为“黑色法国人”或“黑色英国绅士”。克里奥人在近代西非的早期社会生活中多以上层人自居。尽管如此，他们中间

还是有一些先进分子对殖民政策和种族歧视极为不满。拉各斯的克里奥人曾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掀起姓名改革运动，号召非洲人丢掉欧洲姓名，采用约鲁巴姓名；他们对新颁布的英国教育法案不提必修约鲁巴语言表示极大的愤慨，先后召集两次集会进行抗议。^③塞拉利昂的克里奥人揭露殖民政府极力贬低非洲人的能力、排挤非洲人的行径，认为“这种险恶用心的基础就是种族歧视，它是反对人类理智的”。^④在这些先进分子中，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是杰出的代表。

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的童年是在西印度群岛度过的。由于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他被剥夺了进神学院深造的机会。为了实现为黑人争取自由权利的理想，1851年，他来到当时已取得独立的利比里亚。他不仅通过自学掌握了七、八种语言。而且通过编辑工作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他的第一篇著作《流血中的非洲的呼声》中，他提出黑人应该为自己种族的历史和成就而自豪。1861年，他成为利比里亚学院教授。由于他的卓越的语言才能，美国的语言学会聘请他为会员。汉密尔顿学院授予他名誉文学硕士称号，尽管他在语言文学上很有造诣，他毅然放弃了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为他提

①参见利奥·斯派泽：《塞拉利昂的克里奥人》，威斯康星1974年版；帕特里克·科尔：《拉各斯政治中的现代和传统精英》，剑桥1975年版；小威斯利·约翰生：《塞内加尔的城市精英（1900—1945年）》，见菲利普·D·柯廷：《非洲和西方：对欧洲文化的理性反应》，威斯康星1972年版；道伍·罗伦：《达荷美的殖民地精英》，载《非洲研究评论》1974年第1期。

②巴黎海外国家档案达荷美卷，引自道伍·罗伦：《达荷美的殖民地精英》，载《非洲研究评论》，1974年第1期。

③帕特里克·科尔：《拉各斯政治中的现代和传统精英》，第209页，注72。

④利奥·斯派泽：《塞拉利昂的克里奥人》，第68页。

供的上大学的机会。决心致力于非洲民族斗争。

1864年,他出任利比里亚国务卿。以后的50年里,他在西非各地进行宣传鼓动。他在塞拉利昂创办了《尼格罗人报》,并为《拉各斯星期纪录报》和其他西非民族知识分子办的报刊杂志撰稿,讨论非洲的古代文明、伊斯兰教的影响、非洲的教育事业和黑人独立的前途等社会问题,为西非的民族独立运动在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工作。布莱登的杰出才能和贡献不仅使西非人民对他深怀敬意,就是一些白人学者也对他表示钦佩,赞扬他不仅是“一位世界闻名的学者和作家,十九世纪黑人最伟大的战士,而且是一位对西非命运有影响的政治家”。^①

这就是近代西非民族知识分子早期的两支主要源流。随着殖民统治的确立和西方文明的渗透,知识分子的来源不断扩大,他们逐渐聚合为一支可观的政治力量,担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

近代民族知识分子的形成

上面谈了西非近代知识分子早期的两支主要源流,那么,西非近代知识分子队伍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在一些非洲史著作中间接提到过这个问题。美国学者柯廷等人认为,西非海岸地区的知识分子在1850—1890年统治着这一地区,随着欧洲人的征服,他们的影响衰退了^②;还有的学者认为,西非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反应最早始于十六世纪,在十九世纪中叶,他们已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集团^③。我们认为,尽管西非的发展很不平衡,但如果把西非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近代知识分子队伍大约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开始逐步形成,在沿海地区尤其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知识分子已经作为一种社会力量

出现了。

霍顿于1868年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西非的国家和人民》。在序言里,他谈到写这本书的目的,“我希望下述内容(尽管我担心很不完善),将使他们信服:非洲人不是没有能力发展的;借助于友好和有能之辈的帮助,他们定能在一定时间内崛起,在文明世界的历史上取得显著的地位。”^④他用大量已掌握的史料证明非洲在古代文明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引用一些欧洲人在非洲的亲身经历来驳斥“非洲人天生落后”的谬论,并且真诚地希望英国能帮助非洲人前进,使一个落后民族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在第三部分《各个殖民地和定居点的需要》中,他分章节叙述了塞拉利昂、冈比亚、黄金海岸、拉各斯各殖民地的需要,详尽地提出了改革措施,要求“扩大公民权”、“促进教育”。^⑤他的主张对促进殖民政府的一些改革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为西非民族主义思潮提供了早期的精神食粮。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塞拉利昂,福拉湾书院已培养了一批教师和教士,基西的工艺学校以及三所高等书院也培养了一批学生,据一位曾在殖民地视察的英国督学

①参见罗伯特·W·朱赖:《十九世纪的黑人传统精英:爱德华·布莱登》;霍利斯·R·林奇:《爱德华·W·布莱登:西非最早的民族主义者》,分别载《非洲历史杂志》1964年第1期,1965年第3期;理查德·魏斯特:《回到非洲去,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史》,伦敦1970年版,第4部分,第2章。

②菲利普·柯廷等:《非洲史》,伦敦1978年版,第569—570页。

③转引自菲利普·D·柯廷:《非洲和西方:对欧洲文化的理性反应》,第75页。

④J·阿非利堪纳斯·霍顿:《西非的国家和人民》,“原版序言”,第9—10页。

⑤J·阿非利堪纳斯·霍顿:《西非的国家和人民》,第181—182页。

说，有95所学校邀请他去视察。^①同时，《非洲宣讲报》、《黎明及塞拉利昂记者报》和《西非先驱报》都已在起着某种宣传鼓动作用，如《非洲宣讲报》斥责一个受总督雇佣的非洲人是“卑躬屈膝的癞蛤蟆”^②，周刊《新世纪》明确指出，“考虑人民的福利是首要的大法”^③。在拉各斯，1850年以后涌进了大批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他们是以前从这一带海岸被抓去的奴隶或黑奴后裔，来自塞拉利昂、巴西和古巴^④，他们对拉各斯的社会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如J·W·约翰生，一位从塞拉利昂归来的知识分子，在阿贝奥库塔成立了埃格巴统一管理委员会，这个以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为核心的组织，在1865—1872年期间掌握着这里的实权^⑤。黄金海岸的知识分子成立了各种文化组织，如“会友社”（1859年），并开设了第一个阅览室（1860年），还有“节制社”（1862年）^⑥；《黄金海岸时报》、《阿克拉论坛》等报刊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法国的殖民活动此时集中在塞内加尔河口、圣路易沿海地区和达喀尔。1854年，费德尔布担任塞内加尔总督。为了便于法国对西非的渗透，他认为要让信奉穆斯林的非洲人有机会进入法语学校。为此，他组织建立了13所学校及一些夜校，并为这些学校配备了法国教师，推行同化教育。^⑦他还在圣路易建立了一所酋长子弟学校，专门接受酋长的后代（也称为人质学校），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一批土著上层人物来协助我们的文明事业”^⑧。同时，法国殖民政府也鼓励传教士建立学校，圣灵传教会在记录1857年达喀尔的教会学校活动情况的笔记中谈到，“……我们教育那些小孩，他们往往只有五六岁就来了。如果他的智力水平允许，他的教育将继续下去；他可以从小学一直升到中学，在我们的物质条件许可范围内他将受到与法国中学同等的教育。如果学生智力不够发达，

承受不了这样繁重的课程，我们就教给他一些有关法语、算术和书写的基本规则，我们将他培养成一个工人。……目前，在达喀尔，我们有70个小孩，……”^⑨。这些学校的学生分别来自加蓬、普林西比岛、大巴萨姆、巴瑟斯特、圣路易等地。虽然我们没有关于法属西非知识分子当时活动的确切史料，但这些学校的学生在客观上构成了这一地区的早期知识分子队伍。

西非知识分子队伍开始形成的第二个标志，是当地酋长和殖民政府都已经把他们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有活动能力的社会集团来看待了。这一点突出表现在黄金海岸等地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黄金海岸的知识分子相当活跃，传统酋长对他们采取一种合作态度。1869年8月，威廉·鲁特罗德，“阿克拉受过教育的土著们的公认领袖”，召集当地的知识分子约60人，共同商议抵抗阿散蒂的事务，詹姆斯城、“荷兰阿克拉”和基督堡的酋长首领都接受邀请，出席了这一会议。^⑩ 芳蒂联邦于1868年成立时不过是一个由芳蒂族酋长们组成的松散联盟，随后他们吸收了一些知识分子参加，如

①②③ 克里斯托夫·法伊夫：《塞拉利昂史》，牛津1962年版，第359页，第356页，第280页。

④ 帕特里克·科尔：《拉各斯政治中的现代和传统精英》，第45页。

⑤ 菲利普·柯廷等：《非洲史》，第377页。

⑥ D·基姆伯：《加纳政治史（1850—1928年）》，第146页。

⑦ 小威克利·约翰生：《塞内加尔黑人政治的出现》，第28—29页。

⑧ 黑利勋爵：《非洲概览》，第1,200页。

⑨ 约翰·D·哈格利乌斯：《法国与西非：历史文件选集》，第103页。

⑩ D·基姆伯：《加纳政治史（1850—1928年）》，第239页。

加尔迪、乔治·布兰克逊等，并任命加尔迪为芳蒂国民最高法院的最高法官，后来他还担任了芳蒂联邦总统。^①这些知识分子与酋长们密切配合，于1871年制定了一部成文宪法《曼克西姆宪法》。在黄金海岸从事殖民教育达16年之久的威廉·瓦德曾评论说，“联邦宪法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很注意受过教育的人同传统酋长的合作。”可以说，芳蒂联邦是西非传统酋长承认受过教育的民族知识分子的能量并与之联合的第一个典范。

这时，殖民政府却为知识分子对酋长和群众施加的影响担心。早在1852年，新任总督在一封信中指出，一些受过教育的土著“正以某种与其地位不相称的权威架式在对酋长和头人们施加不适当的影响，秘密地全面反对总督的工作。”^②到六十年代末，殖民官员的抱怨更多了，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一些所谓的学者”、“混血种和受过半拉子教育的黑人”^③，他们或是充当当地人的律师，或代酋长写信、当翻译。^④代理行政长官在信中诅咒“那些‘学者’或受过半拉子教育的土著的可恶的干涉”^⑤。1869年，代理行政长官曾因为“过于充分地使用‘受过教育的土著’”而受到政府的批评。^⑥虽然国务大臣曾劝告最好“不要把受过教育的土著作为一个集团来打交道”^⑦，但殖民官员却对他们颇觉头痛，“‘受过教育的土著’或‘学者’……一直是黄金海岸政府的肉中刺，过去一些年来，他们是海岸大部分麻烦事情的起因”^⑧。这些充分说明，民族知识分子的活动已经给殖民官员造成很大压力，英国政府也不得不以一种官方态度来重视这些知识分子的影响了。

由于近代奴隶贸易和传教士的影响，西非较早地接触了西方文化，这在西非的历史上必然留下痕迹。被释放的奴隶最初对于使自己摆脱了奴役状态的欧洲文明强国颇有好

感；可是，回到家乡后殖民奴役的新枷锁又套到了自己的脖子上，这与资产阶级近代文明的精髓——自由、民主是那样的相违。同样，基督教义是为了拯救黑人的灵魂，使之接受西方的殖民统治；事与愿违，人们从基督教平等博爱的教义中悟出了种族平等、黑人白人互爱的道理，而这却与殖民统治的残酷现实又是那样地相悖。这一切引起了西非人民，特别是品尝了西方近代文明“智慧之果”的西非知识分子的深思。

具有西非近代思想的民族知识分子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他们对于殖民统治和宗主国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亲近到仇恨的转变。伴随着这种思想上的转变，西非知识分子也就完成了由殖民统治的工具到反帝反殖斗争的先锋这一政治上的革命转变。纵观近代西非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将它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从民族知识分子的形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第一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为第二时期。

从幻想迷惘到要求内部改革

幻想迷惘——不满抱怨——要求内部改革，是西非知识分子在第一时期对殖民统治

①D·基姆伯：《加纳政治史（1850—1923年）》，第236—238页。

②③④英国殖民部文件96/25, 96/76, 96/70, 分别引自G·E·梅特卡尔夫：《大不列颠与加纳：加纳历史文件（1807—1957年）》，加纳大学1964年版，第232页，第323页，第313页。

⑤英国殖民部文件96/77, 引自G·E·梅特卡尔夫：《大不列颠与加纳：加纳历史文件（1807—1957年）》，第325页。

⑥⑦⑧英国殖民部文件96/81, 96/85, 96/115, 分别引自D·基姆伯：《加纳政治史（1850—1928年）》，第90、91页。

的反应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反应,但这毕竟是一种觉醒。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这一点,有必要对民族知识分子这一时期所走过的艰辛曲折的道路作一纵的剖析。

从初步形成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为第一阶段。这时知识分子的成份主要为废奴运动后归来的克里奥人和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这就基本上决定了他们对殖民统治的政治态度。克里奥人为自己的自由感恩于西方,而教会学校的学生则认为欧洲人为他们带来了知识。除个别先进分子对殖民统治的实质有所认识外,绝大部分沉缅于对欧洲殖民国家的迷信幻想之中。“我们可以说是由英国生育和养育的民族,我们把英国看作父母,从那里我们以与其他出生在英格兰的英国臣民一样的态度接受教诲、忠告、指导和提携。”^①在法属西非,那些出生在圣路易、达喀尔、卢菲斯克和戈雷的居民早从1848年起就算为法国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受过教育的非洲人由于殖民同化政策而享有一种特殊地位,这些都使法属西非的知识分子采取一种亲法态度,以法国公民为荣。

当然,也有一些民族知识分子开始用各种方式来重现非洲人的自尊。在十九世纪末,英属殖民地先后出现了姓名改革与服装改革运动,即放弃欧洲姓名,重新采用非洲姓名;丢掉不适用的欧洲服装,重新穿上本地服装。^②欧洲人占领西非后,首先强行推行欧洲语言。针对这种殖民政策,一些知识分子发起了土语运动,提倡用非洲语言教学,讲授非洲地理、历史、文学。^③可是,由于处在一个把对宗主国的忠诚看作“骄傲和自尊”的年代,这些运动不是夭折,就是响应者寥寥。

然而,这种迷信和忠诚很快就被八十年代日趋泛滥的种族歧视摧毁了。随着对非洲殖民瓜分的完成和殖民统治的确立,曾受过

欧洲革命鞭挞的种族主义又一次沉渣泛起。在西非,一些在拉各斯和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传教工作中卓有成效的非洲传教士被罢免了^④,到医务部门的申请者必须是欧洲人血统,一些需要知识的部门的最高职务开始排挤非洲人并逐渐为欧洲人独占。如在尼日利亚,原来在高位上任职的非洲黑人为数不少,有的担任副总督,有的担任副行政司法长官,有的任地区长官或刑事检查官;1898年,代理总督丹通公开宣称,高级职务要由欧洲人担任,到1900年,担任高级职务的非洲人只有亨利·卡尔一个人了。^⑤在任命、提职、加薪和职业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种族歧视和公务“欧洲人化”使西非知识分子惶惑了。同时,殖民主义者对内地的野蛮征服及内地人民的顽强抵抗引起了沿海地区各阶层对内地人民的同情,也使知识分子对内地酋长从敌视转为尊敬。^⑥这样,对殖民统治的怀疑开始了。

可以说,在第一阶段,从对宗主国的幻想、迷信到惶惑怀疑,是西非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主要心理特征。

第二阶段是从二十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一阶段,西方民族知识分子对宗主国从惶惑怀疑到不满抱怨。

①《塞拉利昂新闻周刊》,1890年10月10日,转引自利奥·斯派泽:《塞拉利昂的克里奥人》,第41页。

②参见D·基姆伯:《加纳政治史(1850—1928年)》,第518—519页;利奥·斯派泽:《塞拉利昂的克里奥人》,第118页;帕特里克·科尔:《拉各斯政治中的现代和传统精英》,第209—210页。

③帕特里克·科尔:《拉各斯政治中的现代和传统精英》,第52页。

④霍利斯·R·林肯:《爱德华·W·布莱登:西非最早期的民族主义者》,载《非洲历史杂志》,1965年第3期。

⑤⑥帕特里克·科尔:《拉各斯政治中的现代和传统精英》,第75页,第71页。

怀疑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殖民政府的种族主义态度。这种种族歧视最早的受害者只能是与欧洲人接触最多、交往最直接的知识分子集团，因此，最初的怀疑情绪也不局限于知识分子。到二十世纪初，种族歧视并没有丝毫改变。据统计，到1908年，黄金海岸的274个高级文职官员中，只有5名非洲人，除了弗朗斯·史密斯法官外，其余4人均居较低职位。^①随着种族主义的蔓延，不满增多了，抱怨出现了。“我们是本地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却成了白人的外人，在很多事情上，如果不说是在所有事情上，和他们迥然相异。白人与我们的地位是主人与臣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②同样受过教育，白人与黑人的待遇差别极大，非洲人被说成是不够格的低能儿，所有高级职务只能由欧洲人担任。这些都是与殖民主义者已确立在西非的殖民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在英属西非，知识分子留恋维多利亚时期，对张伯伦的殖民政策很反感，“我们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张伯伦的帝国主义，在这个时代里，有色人种没有份。自从慈善的女王去世后，有色人种，特别是西非人民逐渐被逼入绝境了^③。在法属西非，殖民教育政策以培养未来的酋长代理人为目的。首先专门建立了一些酋长子弟学校。到1904年，法属西非的教育系统形成，分四类学校：小学、职业学校、高级小学和商业学校，还有一所教师培训学校。^④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发挥作用了。到二十世纪初，已有一批“代人写信”的人，他们为农民申诉，使殖民当局很恼火。1912年，无故被判刑的教师姆巴耶正是用这种方式向总督抗议，当局惧于舆论压力，改变原判，在二十四小时内将他释放了。^⑤

在这一阶段，知识分子的不满还只是处于自发阶段。表达不满的方式仅局限于抱怨，虽然也出现了“土著权利保障协会”这

类由民族知识分子领导的进步组织，但大多数知识分子仍以英国臣民、法国公民自居。以“塞内加尔人的塞内加尔”口号当选为法国政府第一个非洲议员的布莱斯·迪阿涅曾为法国政府在西非招募黑人士兵竭尽全力。^⑥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美洲大陆的影响已开始波及西非民族知识分子。黄金海岸民族运动领袖凯斯利·海福德在1904年写给泛非运动著名领导人杜波依斯的信中谈到自己读了《黑人的灵魂》（杜波依斯著）一书，建议美洲和非洲的思想家互相交流意见^⑦；曾任土著权利保障协会书记的阿格雷在美国留学期间写信给杜波依斯，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称他为“我们的摩西”，并希望就读于杜波依斯门下。^⑧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则给西非民族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启示和新的力量，一次大战的重大影响首先表现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指明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同时，威尔逊和劳合·乔治关于人民自决权的讲话也给西非民族知识分子带来了美好的希望。他们把同盟国的胜利看作是争取自由解放的机会。但是，列强在凡尔赛会议上对

① D·基姆伯：《加纳政治史（1850—1928年）》，第100页。

② 《塞拉利昂新闻周刊》，1910年8月6日，引自利奥·斯派泽：《塞拉利昂的克里奥人》，第108页。

③ 利奥·斯派泽：《塞拉利昂的克里奥人》，第69页。

④ 道伍·罗伦：《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达荷美》，伦敦1975年版，第60页。

⑤ 马丁·A·克兰：《塞内加尔的伊斯兰教和帝国主义（锡那一沙农1847—1914年）》，美国1968年版，第214—215页。

⑥ 迈克尔·克劳德：《殖民地西非》，法兰西斯1978年版，第114—116页。

⑦ ⑧ 赫伯特·阿普代克：《杜波依斯通信集》第1卷，76萨诺塞1973年版，第76页，第181—182页。

多哥和喀麦隆的处理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西非人民的民族意识在觉醒，民族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兴趣明显增强了。

英属西非国民大会的成立标志着民族知识分子作为民族运动中一支起着先锋作用的政治力量出现在西非舞台上，开始公开向殖民主义者要求自己的权利。“我们不相信私下的抱怨，我们信奉公开阐明自己的需要，”^①他们已经不是消极地自我反省了。会议开了两星期，来自英属四个殖民地的代表对十一个主要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立法改革（包括市政）与公民权的授予”、“教育以及西非大学的设想”、“司法改革”、“政府关于土地问题的政策”、“人民的自决权”等内容。^②大会对欧洲大国任意处置德属非洲殖民地多哥和喀麦隆的野蛮行径表示极大的义愤，在会议关于“自决”的议案中，他们严厉谴责欧洲大国“不参考或考虑人民的愿望就在他们之间相互交换或瓜分非洲国家的那种权利”，认为“这种做法等于一种奴役制度”。^③大会还向伦敦派出代表团，向乔治五世递交了请愿书。

战后，各种知识分子的社会组织出现了。除了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外，英属西非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尼日利亚青年运动、黄金海岸青年会议、西非青年联盟等。塞拉利昂的J·W·约翰生是这个时期英属西非的风云人物。他先后在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和塞拉利昂活动，开展宣传活动，组织工会运动。他创建的“西非青年联盟”对整个西非的民族运动起了很大作用。他公开宣称，我们今天的斗争是为了“经济和社会解放”^④；他的活动引起了殖民当局的恐惧，代理总督布拉德承认他“不仅是对当地利益而且是对整个帝国的威胁”^⑤。被誉为尼日利亚“民族主义之父”的赫伯特·麦考莱也是民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在1922年创建了尼日利亚民族民主党，在支持酋长反对殖民政府

的“埃累科事件”^⑥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斗争精神和灵活的斗争策略，使他赢得了尼日利亚人民的信任，从而奠定了他在民族斗争中的领导地位。

在法属西非，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民族知识分子领导的民主组织开始在塞内加尔和达荷美积极活动，波多诺夫附近地区的居民就是在他们影响下，于1923年初举行了抗税斗争，法国殖民政府派出军队才把群众镇压下去，早在1928年，在塞内加尔建立了一个社会党；这时期比较活跃的是达荷美第一位民族主义的斗士路易斯·霍坎宁。他毕业于圣路易师范学校，一走出校门，他就与达荷美的总督发生冲突。他建立了“人权联盟”达荷美支部，并主编塞内加尔《民主》杂志。1914年曾因反对总督而遭逮捕；逃到尼日利亚后，他又发表非法小册子，抨击殖民统治。1916年，他曾将一份历数达荷美代理总督鲁弗拉德罪行的信件托人权联盟主席转送给法国殖民部长，他的这些活动使殖民政府大伤脑筋，最后只好将他流放了

①“会议文件”，1919—1920年第7号，引自D·基姆伯：《加纳政治史（1850—1928年）》，第382页。

②③D·基姆伯：《加纳政治史（1850—1928年）》，第382—383页，第384页。

④《塞拉利昂新闻周刊》，1938年5月7日，引自利奥·斯派泽：《塞拉利昂的克里克人》，第191页。

⑤英国殖民部文件267/670/32210/2第一部分（1939年），引自利奥·斯派泽：《塞拉利昂的克里克人》，第203页。

⑥埃休格巴伊·埃累科曾是拉各斯的国王。英国政府在1920年底撤消了对他的承认，并于1925年将他放逐。经过长期斗争，他于1931年复位。在力争国王复位的斗争过程中，麦考莱起了很大作用。详见帕特里克·科尔：《拉各斯政治中的现代和传统精英》，第五章。

事。^① 二十年代，他继续出版刊物，进行宣传鼓动。

民族知识分子作用的增大引起了殖民当局的担心，在英属西非，殖民政府将注意力转到传统酋长身上。卢加德的间接统治制度系统地提出来了。在法属西非，殖民政府力图以同化政策来收买受过教育的非洲人，给他们以某种特权，想以此离间民族知识分子与下层群众的关系，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对民族知识分子和群众及酋长实行离间是英法殖民政权的共同之处。

由于一次大战和留学生增多，西非民族知识分子与外界的接触频繁了，一些政治思潮的影响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泛非运动。1919年第一届泛非大会有12名非洲代表，在这次会议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地的黑人与非洲本地人在土地、资本、劳动力、教育和国家等方面的要求。^② 随后在1921年、1923年和1927年又召开了三次泛非大会；这一运动对西方殖民制度和白人种族主义无疑是一个挑战，它唤醒了沉睡的非洲大陆，使非洲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泛非运动的主要领袖杜波依斯为种族平等的主张大声疾呼，为非洲人民的独立解放贡献了毕生精力。泛非运动另一流派的领导人是马克斯·加尔维。虽然他有某种黑人种族主义倾向，并过多地追求表面的东西，但他采取一种更接近下层群众的方式，因而对非洲人民的影响也很大。恩克鲁玛说过，“在我读过的一切书籍中，最能够激发我的热情的一本书，就是《马克斯·加尔维的哲学和思想》。^③ 加尔维“非洲人的非洲”的思想和“回到非洲去”的运动，在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西非人民。^④

科学社会主义也传播到西非地区。在法属西非，共产主义研究小组遍布达喀尔、科纳克里、阿比让、巴马科等地。^⑤ 这些小组鼓励非洲青年知识分子努力发展非洲哲学和

非洲文化。在英属西非，共产主义思想对青年运动有一定影响，同时也在留学生中间传播。恩克鲁玛谈到在美国留学时，“马克思和列宁对我的影响特别深，因为我确信他们的哲学能够解决那些问题。”^⑥

种族主义对西非知识分子不能说没有影响。白人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政策使一些民族知识分子倾向于黑人种族主义，这当然是对白人种族主义的一种抗议。桑戈尔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们是种族主义者，我们在**黑人精神**的标记下欣喜若狂。那时，与欧洲对话是不可能的。”^⑦

在这一时期，民族知识分子在内部结构和自身素质上均有很大变化。殖民统治在西非确立以后，英法殖民政府为了维持和加强统治，推行同化政策，先后在西非建立了一些学校。这样，教会学校的主导地位逐渐为官办学校所取代。在法属西非，1934年官办中学已有600名学生；到1944年，76,000名学生中，官办学校的学生有57,000名，占在校学生总人数的75%，而教会学校的学生只有19,000名。^⑧ 英属西非的官办学校相对而

①伊曼纽尔·盖斯：《泛非运动》，伦敦1974年版，第307页。

迈克尔·克劳德：《殖民统治下的西非》，西北大学1968年版，第445页。

②参见“决议”（泛非会议，巴黎，1919年），引自科林·利基姆：《泛非主义：简明政治指南》，伦敦1962年版，附录1。

③恩克鲁玛：《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

④参见阿米·雅克·加尔维：《马克斯·加尔维的哲学和思想》，法兰凯斯1967年版，第一部分，第4—5节。

⑤菲利普·尼雷斯：《法语西非》，牛津，1962年版，第40页。

⑥恩克鲁玛：《恩克鲁玛自传》，第48页。

⑦J·L·海曼斯：《列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的思想传记》，爱丁堡大学1971年版，第72页。

⑧迈克尔·克劳德：《殖民统治下的西非》，第376页。

言较少，但英国政府却提供了一些出国留学的机会。如1943—1944年度，福拉湾学院有17名学生，阿契莫塔学院98名，亚巴高等学校100名，马克雷尔学校128名；而当时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则有250名左右。^①这些西非学生毕业后多从事教师、律师、医师、职员、新闻工作者等职业。由于他们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文明，民族意识增强了；加上他们阅历深、见识广、政治敏感性强，因而逐渐取代了早期的教会学校的学生和克里奥人而成为后来的民族独立运动的中坚分子。

与此同时，民族知识分子的自身素质也在不断加强。对整个殖民统治制度的反感代替了对殖民官员和殖民政策的不满，要求殖民机构进行内部改革的呼声代替了无济于事的私下抱怨。最可贵的是，民族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逐渐在反殖运动中承担起领导责任。^②当然，这一时期的反殖斗争，正如狄克博士在分析尼日利亚情况时所说的那样，“斗争开始时还不是为了要求自治，而是为了要在一定程度上参加现在的政府。”^③至于提出民族自治或民族独立的要求，广泛发动群众与殖民统治作斗争，这一任务要待二次大战才能完成。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民族独立运动积蓄力量的阶段，群众性的斗争引而未发，各种政治力量的活动方兴未艾，这一切是战后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先决条件。

新时期的崭新姿态：要求民族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民主力量的胜利而告结束，这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西非民族知识分子，促进了西非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

第五次泛非大会标志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如果说，以前的

四次泛非大会还只是停留在思想方面，或仅仅以敦促殖民统治进行内部改革作为目标的话，这次大会则具有明显的反帝反殖性质，并以采取积极的政治行动来赢得自治为目的。这次大会的另一特点是会议主要由非洲的民族知识分子发起、组织和领导。大会通过的决议对西非表示了特别的关注，旗帜鲜明地指出：“自从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和其他欧洲人来到西非以后，西非一直在后退，而不是进步；这一切正是外来的帝国主义列强所实行的系统剥削的结果。什么‘伙伴关系’、‘托管关系’、‘保护关系’和‘委任统治制’，统统不符合西非人民的政治愿望。”^④决议对帝国主义在西非的殖民法规、宪法改革、间接统治和人为的边界进行了谴责，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掠夺非洲经济资源、阻止西非的工业化、强占土地和禁止独立的工会运动等罪恶行径。^⑤恩克鲁玛起草的《告殖民地人民》中特别号召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迅速觉醒，“认识自己的责任，争取工会的权利和组织合作社的权利，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示威和罢工自由，争取印刷和阅读为教育群众所必需的作品自由。”^⑥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泛非会议闭幕后恩克鲁玛的巴黎之行。他和法国国民议会中的非洲议员苏鲁·阿皮蒂、列·塞·桑戈尔、拉明·盖伊和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等商谈共同进行反帝反殖斗争的问题，这是英属西非的民族知识分子与法属西非的民族知识分子谋求有组织合作的最初尝试。

① 黑利勋爵：《非洲概览》，第1179页。

② 利奥·斯派泽：《塞拉利昂的克里奥人》，第191页。

③ 贾克·沃迪斯：《非洲——睡狮醒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25—26页。

④⑤⑥《第五次泛非会议主要决议》，引自科林·利基姆：《泛非主义：简明政治指南》，附录II，第135页，第135—136页，第137页。

二次大战后民主力量的强大迫使殖民主义者进行一些改革来适应新形势。英属西非当局想通过宪制改革来调整殖民统治与非洲人的关系，殖民政府先后在黄金海岸、冈比亚、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颁布了新宪法。法国也想通过改革来弥补法属殖民地出现的裂痕。有关殖民地改革的法令有：关于取消土著民权制度的两个法令；关于承认结社自由的法令；关于集会自由的法令；关于承认新闻自由的法令。1946年，法兰西联邦新宪法颁布了，但法属西非的殖民地地位并未有所改变。这些宪制改革，遭到了各民族主义政党的反对。西非新一代民族知识分子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他们认识到在现存的殖民地政权之下不可能享有政治权力。”^①

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阿齐克韦留学回国后，就开始在反殖斗争中显露他的政治才华。1937年，他被殖民政府宣判犯有煽动毁谤罪，他慷慨陈词，“如果我是命运的工具，借此可以使帝国主义在西非遭到挑战和清算，如果在这一使命中我被迫遭受极刑，那么，我没有必要颤抖或动摇。”^②在1943年西非新闻工作者赴英代表团提交的备忘录中，在1945年大罢工的宣传鼓动中，在1947年赴英代表团提交的备忘录中，都留下了他的政治痕迹。“在整个黑非洲，一场民族自由的斗争即将发生，因为帝国主义的种种因素窒息了非洲人在民族共同体内的正常发展。”^③他大声疾呼，率领尼日利亚人民向英国的殖民统治作斗争。

民族知识分子的另一卓越领袖是恩克鲁玛。早在美国留学时，他就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曾任美加非洲学生协会主席，是第五次泛非大会组织者之一。回国后，他首先领导了统一大会党，随后又创建了人民大会党，成为西非民族独立运动中的领导者。1948年，他指出：“当前的斗争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多少年来，这场战斗紧张持续，始终

朝着一个目标——西非的完全独立。”对于这一伟大神圣的事业，他始终充满信心，并以此激励广大群众，“让我们所有的人对我们正义的事业满怀忠诚充满信心，……朝着我们前面的政治解放、经济复兴和社会更新的目标奋勇前进。”^④黄金海岸在他的领导下成为西非第一个赢得独立的国家。

由于在布拉柴维尔会议上戴高乐将军作过许诺，法属西非的民族知识分子对殖民统治抱有某种幻想。他们或是希望成为法兰西联邦的成员，或是期待成为法兰西共同体中的伙伴。尽管如此，他们从未放弃过民族自治的要求。桑戈尔甚至在1946年就提出过独立的可能性，并指出，西非人民将不惜采用任何方式，甚至暴力“来取得他们的解放。”^⑤1956年结构法颁布，法属西非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主权，但因为结构法取消了“公民”和“臣民”的两个选举团制度，大部分非洲人还是把它看作是走向独立的一个步骤加以欢迎。但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并不抱多大希望，认为结构法是一个倒退，是使黑非洲联邦巴尔干化，“如果非洲人愿意，结构法可能成为解放的工具。”^⑥

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深入发展，新一代的民族知识分子脱颖而出，开始以自觉的姿态投入到反帝反殖斗争之中。他们主要包括毕业于殖民地学校的知识分子和海外西非留学生。美国学者柯廷曾认为，西方教育是作用于黑非洲的各种影响中最革命的因素^⑦。

①恩克鲁玛：《恩克鲁玛自传》，第78—79页。

②③N·阿齐克韦，《恩纳姆蒂·阿齐克韦言论集》，剑桥1961年版，第57页，第6页。

④克瓦米·恩克鲁玛：《我兴自由》，伦敦1961年版，第5页，第34页。

⑤J·L·海曼斯：《列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的恩思传记》，第149页。

⑥菲利普·尼雷斯：《法语西非》，第70页。

⑦引自阿里·A·马兹鲁伊：《非洲的政治价值观和教育阶级》，加利福尼亚大学1978年版，第1页。

从历史的辩证法来看,这种观点不无道理。殖民主义者在进行殖民教育的同时曾极力防止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成为任何类型的民族政治运动的领袖或高级官员”^①;然而,历史——这个报应的工具却使得这些从殖民学校毕业的非洲人转而反抗殖民剥削和压迫,担负起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重任。殖民主义者威廉·蓬蒂创立的蓬蒂学校的毕业生中就包括几乎所有法属西非国家的民族主义领袖,其中绝大多数后来成为了独立国家的首脑或政府领导人。他们中间有: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塞内加尔总理马马杜·迪亚、达荷美总统马加、上沃尔特总理库里巴利、象牙海岸总统乌弗埃-博瓦尼、尼日尔总理基博·巴卡里。^②在加纳,从阿契莫塔学院毕业的政治领袖包括:人民大会党创始人、加纳首任总统恩克鲁玛、人民大会党第一副主席格贝德马赫,加纳前总理布西亚、北部地区民族主义领袖托隆·纳和阿巴瓦纳、埃维人领袖阿帕鲁、统一国民大会党主席奥弗里-阿塔等。^③

谈到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构成及其在二次大战后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到海外西非留学生的活动和影响。

在伦敦留学的西非学生早在二十年代就成立了一些进步组织。1925年,西非学联成立,它的目标包括“培养自助、团结、合作的精神”,“在其成员中培养一种民族意识和种族自豪感”。西非学联从成立到1945年一直是西非留学生中最活跃的政治组织,它不仅和欧洲的民主组织(费边社、反帝人民大会)保持着联系,还直接在西非开展活动,在阿克拉、弗里敦、拉各斯、伊巴丹等三十多个城市建立了支部。大西洋宪章公布后,西非学联在递交给克莱蒙特·艾德礼的一份备忘录里责问:“英国已宣传它决心恢复和支持欧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的

独立,但对西非怎么办呢?”1942年,西非学联在交给副殖民大臣的备忘录中指出,“为了自由、正义和真正的民主,……西非学联强烈要求英国政府给予英属西非殖民地和保护国以立即内部自治的权利,并切实保证在战后五年内准许其完全自治。”^④西非学联的这些活动对促进殖民地的反帝反殖斗争起了一定的作用。

自从阿齐克韦学成回国后,赴美留学在西非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以尼日利亚为例,赴美留学的在1938年前有20名,1938—1945年为12名,1946—1948年增至175名,1953—1954年达318名。^⑤1941年,美加非洲学生协会成立,协会创办了月刊并和伦敦的西非学联建立了联系。为了使人们对非洲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他们举办各种讲座,巡回演讲,发表文章和著作。在战时留美的28名非洲学生中,我们从其中7名以后的经历就可以看出美国留学生在西非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中所起的极其重要的政治作用^⑥:

有人说,“为尼日利亚2,100万人民的政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最先几次小规模战斗是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打响的。”^⑦这话不免有些夸大,但确有道理。难怪到加纳调查的沃森先生在讯问恩克鲁玛时,当他得知恩克鲁玛在美国攻读的科目后,无可奈何地预言:“先生们,我担心我们在这里有陷入困境的危险。”^⑧

① 阿贾伊、迈克尔·克劳德主编:《西非史》第2卷,朗曼1974年版,第579—591页。

② 迈克尔·克劳德:《殖民统治下的西非》,第383页。

③ 丹尼斯·奥斯廷:《加纳政治(1946—1960年)》,牛津大学1964年版,第15页。

④⑤ J·S·科尔曼:《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背景》,加利福尼亚大学1960年版,第239—240页,第246页。

⑥⑦ J·S·科尔曼:《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背景》,第243—244页,第244页。

⑧ 恩克鲁玛:《恩克鲁玛自传》,第89页。

姓名	国籍	经历和职务
阿科·阿杰伊	加纳	律师，人民大会党政府商业部长
阿克帕比奥	尼日利亚	大学校长，尼日利亚喀麦隆国民会议党、 政府东部地区副总理兼教育部长
非茨约翰	塞拉利昂	教授，塞拉利昂人民党执委会委员
琼斯—凯提	加纳	加纳大学学院院外研究系副主任
阿·姆巴迪威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工商部长
恩克鲁玛	加纳	总理，人民大会党创始人，终身主席
卡瑞法—斯玛特	塞拉利昂	医生，塞拉利昂政府土地矿业劳工部长

在巴黎的法属西非留学生也很活跃，从一次大战后就成立了一些学生组织，尤以1933年成立的西非学生协会影响最大。协会的文化宗旨是“同化欧洲文化，与你们的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①协会每月举行座谈，“由于经常交换意见，西非学生可以逐渐培养一种共同的思想意识。”西非学生协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后来都成为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风云人物，如主席桑戈尔，后来成为塞内加尔民主党和独立党的创始人，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副书记奥斯曼·索塞·迪奥普，后任塞内加尔驻美国大使和驻联合国大使；司库阿里斯提德·伊萨姆贝，后任加蓬大使^②。

西非在欧美的留学生之所以能在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起重大作用，主要是因为他们充分利用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广泛联系各种左翼组织，汲取有利于民族解放斗争的经验，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加强内部团结，从而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了充分准备，以便战后一旦回国后就能投入到民族独立运动中去。

二次大战以后，西非进入了为独立而斗

争的决战阶段。各种以民族知识分子为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纷纷建立，他们已从要求殖民机构内部改革转到了争取摆脱殖民统治的斗争，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独立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我们从西非近代民族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发展过程两方面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移植资本主义给殖民地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及其相伴的各种新的社会因素，民族知识分子的出现是其中之一；尽管在表面上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是依殖民政府的政策而变，但从实质上看，则有着更深一层的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幻想迷惘到觉醒斗争是所有殖民地的民族知识分子都要经历的思想转变；而殖民统治从兴盛到衰亡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必然趋势。

①② J·L·海曼斯：《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的思想自传》，第80页、81页。